

“校园表白墙”成网络欺凌高发载体,该如何维权?

“

不少学校都有“校园表白墙”,它并不是一堵物理意义上的墙,而是由学生或是校外人士运营的非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为在校学生提供情感表达、信息交流和生活服务等。然而,原本用于倾诉心事、分享日常的网络空间在某些时刻却成了散播谣言、滋生恶意的隐秘角落。一句看似玩笑的“网络梗”、一个恶意加工的表情包、一次藏在屏幕背后的匿名诽谤……都可能成为刺向未成年人的利刃,严重的甚至会发展成为网络欺凌,给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事实上,当前网络欺凌正在以更复杂、更隐蔽、更持续的方式侵入未成年人的社交与生活。当欺凌戴上“网络面具”,如何守护未成年人的心灵防线和成长空间?

“校园表白墙”成网络欺凌高发载体

这几天,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正在跟进一则来自一个13岁女孩父亲的求助——患抑郁症的女儿因网络欺凌病情加重,不得不休学在家。

陈强谈道,家长说孩子有一些抑郁症的表现,可能在班级中有的同学会觉得她比较特殊,好几个同学在某一个短视频平台上连续发布了多篇短视频,短视频内容明显指向这个同学,比如可能映射她家庭或者在学校的一些行为等。

在陈强的指导下,女孩父亲已经固定好了证据,即将通过司法途径为女儿维权。近一年,陈强所在的团队为公众提供公益法律咨询服务近5000次,其中与这名女孩的遭遇类似的未成年人网络欺凌案例并不鲜见。陈强介绍,“校园表白墙”就是网络欺凌的一个高频发生载体。

陈强表示,两个同学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过节,其中一个同学可能是向“表白墙”的管理员投稿,投了一篇映射她私生活不好或者类似的情况,管理员也没有对这个事情做进一步审核,

直接就把帖子公布出来了。后来就在学校的范围之内传播,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记者发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未成年人发布求助,反映自己在“校园表白墙”上被恶意造谣。

陈强说,因为“表白墙”的实际管理人大多数是以在校学生青少年为主,他们自身的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相当差。如果学校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对此进行正确引导,那么“校园表白墙”实际上很可能滋生网络欺凌或者其他人身侵权的行为。

当前网络欺凌更隐蔽、更持续、更具扩散性

网络欺凌也就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的欺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网络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恶意损害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

当前,网络欺凌的形态也在悄然演变。

从事互联网未成年人保护专项研究的业内人士表示,相较于早期以直白辱骂、情绪宣泄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欺凌,现如今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正朝着更隐蔽、更

持续、更具扩散性的方向发展,一旦发生很难被快速遏制。

某互联网公司未成年人保护专项研究员谢筱莉谈道,“我们注意到,一些未成年人会将现实生活中的师生矛盾、同学纠纷延伸到线上,通过非法获取他人信息,用来威胁或施压。这类行为一旦发生,极易从网络空间蔓延到现实场景,带来真实风险。”

实际上,一些网络欺凌已经披上了网络文化的外衣,通过恶俗梗、伤痛娱乐化、制作表情包等方式弱化攻击性,但对当事人造成的是更长期、更反复的伤害。

谢筱莉说,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有很多将网络暴力包装成所谓“好玩”“很酷”的表达,以调侃、炫耀的方式对他人进行攻击;对他人形象进行恶意加工,并在同龄人社交圈中反复传播,使受害者在熟人环境下持续承受压力。

据观察,参与网络欺凌的群体已经明显向初中甚至更低年龄段下沉。

谢筱莉表示,欺凌行为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相对固定的社交圈层中。在群体氛围和角色分工的影响下,未成年人很容易被推着走,在并未充分理解后果的情况下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

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王蕾认为,从心理层面看,这种持续性的负面评价和攻击容易引起焦虑、自卑,甚至会引发抑郁症。从社会交往角度看,这类行为容易让未成年人在现实社交圈中被贴标签、被孤立,造成他逃避社交或模仿攻击性行为。

未成年人遭遇网络欺凌怎么办?如何维权?

青少年是“网络原住民”,但他们遭受网络欺凌后往往因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或求助无门而独自吞下委屈,让短期伤害演变成长期的心理创伤。该如何保护这些未成年人,斩断伸向他们的网

络黑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表示,“网络欺凌维权很大的一个难点,比如说未成年人受到欺凌,想维权、想起诉,这个时候证据可能很难找,比如治理了之后把评论都删干净了,就没有证据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规定也是要求平台提供便捷的证据采取措施,比如一键获取证据。而且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我们的规定也要求有特殊的保护机制,比如要有快速的投诉处理机制,要有专门的心理守护机制。”

由于网络欺凌脱离了家庭和学校的视线,青少年无论是欺凌他人还是被他人欺凌,往往都难以在第一时间被周围人察觉。因此,及时洞悉未成年人的内心状态尤为关键。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走进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该校学生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网络安全法治课。检察院成立了近70人的法治副校长团队,每年到海淀区各中小学开展上百场法治课堂进校园活动。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李思瑶谈道,在讲课的过程中,看很多孩子对“网络开盒”非常关注,“我就问他们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行为,很多孩子都会说他了解过这种行为。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法治课让孩子们知道哪些行为是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不可以做的,让他们知道如果不幸遭遇了网络欺凌行为,该如何保护好自己,怎么求助。”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副主任李涵说,被欺凌的一方,社工肯定先要做应急处理,做心理支持,包括对他的家长做一些心理教育,告诉他在睡眠、饮食、行为表现有哪些变化的时候,应当到医院做评估。“同时我们跟孩子要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安全的关系,支持他慢慢得到疗愈,慢慢推动他重新回到正轨的生活中。”

平台主动参与治理前移防线阻断传播

作为网络空间的重要责任方,平台的主动作为与协同联动成为治理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业内人士也表示,作为平台方,他们配合司法机关,持续推动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通过前移防线、协同发力应对网络欺凌。

谢筱莉说,应对组织化、隐蔽化的网络欺凌,关键是前置识别、压缩传播、协同共治。

在识别层面:平台正从单纯“看内容”转向“看行为模式”,通过持续研究圈层特征,结合技术手段识别异常聚集、集中攻击等风险形态,尽量在扩散前介入。

在传播阻断上:治理目标也不仅是删除内容,而是通过限制传播、弱化热度、切断扩散链条,防止攻击行为被围观、被模仿、被放大。

在更系统的治理上:平台还需要与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对涉及隐私侵害、现实威胁等严重情形,依法留存证据、移送线索,通过提高违法成本,让这类行为越来越难发生、也越来越难持续。

公众可参与举报助力阻断恶意传播链条

在这场守护未成年人的行动中,公众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为社会各界参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了便捷路径,一旦发现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行为,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在向相关社交平台举报的同时,可以拨打免费举报电话12377,也可直接登录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进行投诉举报。对于情节严重的网络欺凌,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到法院提起诉讼,助力阻断恶意传播的链条。

(转自央视新闻)

科技向善,图绘边疆——高德携手阿里公益打造黑龙江数字慈善新范式

■本报记者 皮磊

慈善组织党建活动场馆热点图”,方便快速查找身边的公益资源。

地图不仅清晰标注了236家慈善组织及100个党建活动场馆的位置,还提供详细信息展示,包括机构简介、服务内容、开放时间、联系电话及导航路线。无论是爱心人士希望参与志愿服务、捐赠物资,还是基层党组织计划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都能通过地图实现“一图查询、一键导航、一步直达”,真正让公益服务触手可及,让善行善举高效落地。

高德党委长期践行“科技向善”理念,助力打通慈善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爱心资源精准触达需求群体。未来,双方将以数字地图为纽带,推动慈善事业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温暖同行,既照亮善行之路,更夯实民生之基。



黑龙江省慈善组织地图

从体校到奥运领奖台,安踏公益的“全周期”承诺

“

1月的湖南湘西州古丈县,大地在湿冷中低语。薄雾锁着山城,显得静谧古老。县城一角,玉玲举重运动学校的训练馆里却是另一番天地。声音先于景象撞进耳膜——杠铃片沉闷的撞击、铁杆砸向地面的重响、短促有力的呼气、教练带着方言的指令。

并非没有回响。在2024年湘西州第十五届运动会上,12岁的吴潇湘在女子丙组32公斤级项目中,以抓举43公斤、挺举59公斤、总成绩102公斤夺冠,挺举和总成绩双双刷新湘西州纪录。光环之下等待她的,仍将是漫长、枯燥、汗水与铁锈味的重复,她的目标清晰而单纯:在省赛中拿到名次。

深山里的冠军土壤

古丈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有着“举重之乡”的美誉。20世纪70年代,从湖南省举重队退役的曹文富回到家乡古丈县,组建了县历史上第一支举重队。队伍中走出了后来成为国家级教练的甘智锐,也走出了奥运冠军杨霞的启蒙教练李小平。在甘智锐等人的悉心培养下,1991年8月,古丈姑娘龙玉玲一“举”成为该县首位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举重冠军,改写了古丈体育史。

1994年,随着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亲笔题名,“玉玲举重运动学校”正式挂牌。多年来,这座“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以艰苦的训练、托举起一个又一个世界级的梦想,走出了龙清泉、向艳梅等奥运冠军。光环背后,这所深藏县域的体校也长期面临着专业装备更新缓慢、生活物资缺乏的现实挑战。

1月15日,训练馆里回荡着清脆有力的金属碰撞声——那是安踏集团捐赠的崭新杠铃片发出的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与安踏集团“奥运领奖台公益基金”落地湖南古丈



安踏集团携手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向玉玲举重运动学校捐赠总价值超85万元的物资

一,本次安踏集团携手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向学校捐赠了总价值超85万元的物资,包括举重训练器材、专业运动装备及生活用品,为孩子们的训练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

李玲用一个生动的比喻道出了初衷:“就像小树苗的成长离不开早期的培育,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各方共同守护。”

具体可感的榜样力量

在孩子们仰望的目光中,奥运

冠军就是触手可及的星辰。当龙清泉、向艳梅等冠军站在孩子们面前时,孩子们感受到的,是具体可感的榜样力量。

“梦想始于脚下,坚持铸造辉煌!”在本次项目落地活动的“冠军课堂”上,从玉玲举重学校走出的龙清泉,像一位归家的兄长,大方谈起运动生涯的至暗时刻:

“2012年,我甚至没能获得奥运参赛资格。那时我常常在田边散步,看到农民伯伯即使可能颗粒无收也要坚持劳作,这让我明白,为了生活,也为了自己选择的

这条路,必须坚持下去。”他特别提到了与好友兼对手、同为中国男子举重队运动员的吴景彪长达八年的良性竞争,“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训练时较劲,私下互相鼓励。正是这种陪伴和竞争,让我撑过了最难熬的日子,最终在2016年实现了打破世界纪录的梦想。”他看着小队友们稚嫩的面庞,道出最朴素的真理:“坚持不一定有回报,但不坚持肯定没有回报。这是举重教给我最重要的课。”

里约奥运会冠军向艳梅则分享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被临时替换的沉重打击。“那一刻感觉天都塌了。”她回忆道:“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月,通过不断的自我对话和与教练的沟通,才慢慢走出阴影。”她的经历告诉孩子们,追梦路上挫折是常态,但“热爱可以战胜所有的难,要相信自己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

分享环节结束后,理论随即化为实践。龙清泉、向艳梅、谌利军、侯志慧、李雯雯走下讲台,直接融入了火热的训练场。他们手把手为小队员调整动作,向小队员们诠释“体育湘军精神”:“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劲头。冠军一次次的亲身示范、一句句的耐心叮嘱,如同精神的种子,悄然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

面对面的激励产生了效果,有小队员兴奋地说,自己的偶像是龙清泉、向艳梅……眼神中充满了向往。李玲深受触动,她感慨:“体育能改变很多孩子的命运,我们想帮他们一把,而冠军是孩子们向上生长的精神力量。”这正是安踏集团打造“物资支持+精神传承”模式的初心——崭新的器材能改善训练条件,而源自榜样的精神滋养,则能赋予孩子们直面枯燥训练和身体伤痛的勇气。”

“体育强则国强,体育兴则民兴。”古丈县委副书记陈明灯认为,安踏集团的捐赠不仅是对当地举重队的雪中送炭,更让山里的孩子有了更多追梦的可能。

一份长久的牵挂

“奥运领奖台公益基金”不仅着眼于体育后备力量的培育,更将关怀延伸至运动员的全周期保障。

本次活动现场,一场特殊的保单颁发仪式举行。安踏集团与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共同为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举重运动员侯志慧、李雯雯颁发了“优秀运动员终身保障”保单。这份保单,承载的是一份跨越数十年的承诺。

据了解,“奥运领奖台公益基金”始于2023年12月,由安踏集团宣布在五年内捐赠1亿元设立。其规划清晰体现了三大着力点:一是拨付5000万元的运动装备,用于支持包括玉玲举重学校在内的县级体校专业训练,夯实青少年体育基础;二是专项拨款4000万元,与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合作开展“优秀运动员终身保障公益项目”,为巴黎、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洛杉矶三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配置储蓄型保险,提供可延续至终身的切实保障。具体而言,冠军每月可领取6000元,亚军5000元,季军4000元,从60岁开始直至身故;此外,安踏集团和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现金,实施“优秀运动员伤残救助计划”,将用于运动员伤病及困难救助保障。

“不仅提供物资支持,更注重精神的传承。”李玲透露,安踏集团计划将“冠军课堂”与实训指导相结合的模式推广到更多项目和体校。她深感奥运冠军的亲身示范与精神分享,如同灯塔,为小运动员们树立了触手可及的榜样。

一系列举措,共同构筑了一个从青少年培养到职业保障的闭环生态。王卫东赞赏了安踏集团的远见与社会担当,他表示:“希望通过冠军的引领激发青少年的内在动力,并利用创新的保障机制为运动员的长期发展保驾护航。这为我国体育后备人才的可持续培养与公益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文中未成年人为化名)

(韩静)